

全球智库半月谈

下任法国总统面临的任務

政府质量与基础设施回报率

关于宏观经济学的五类模型

G20 支持开放和包容的贸易投资体系的新举措

建立一个更具韧性和包容性的全球经济

美国与东盟：未来四十年关系展望

本期编译

郭子睿

刘立群

史明睿

申劭婧

沈仲凯

谢晨月

伊林甸甸

杨 茜

章珏

张舜栋

(按姓氏拼音排序)

中国社会科学院陆家嘴研究基地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 国际战略研究组

《全球智库半月谈》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主编的中国社科智讯数据分析报告的组成内容，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和国际战略研究组为您提供。

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

主 任	张宇燕		副主任	何 帆
首席专家	张 斌	开放宏观		
团队成员	刘仕国	欧洲经济	徐奇渊	中国经济
	吴海英	对外贸易	曹永福	美国经济
	冯维江	新兴市场	肖立晟	国际金融
	高凌云	对外贸易	熊爱宗	国际金融
	梁永邦	宏观经济	杨盼盼	国际金融
	常殊昱	国际金融	史明睿	科研助理

国际战略研究组

组 长	张宇燕		副组长	何 帆
召集人	徐 进		协调人	彭成义
团队成员	李东燕	全球治理	袁正清	国际组织
	邵 峰	国际战略	徐 进	国际安全
	薛 力	能源安全	欧阳向英	俄罗斯政治
	黄 薇	全球治理	冯维江	国际政治经济学
	王鸣鸣	外交决策	高 华	北约组织
	卢国学	亚太政治	王 雷	东亚安全
	彭成义	中外关系	徐秀军	全球治理
	田慧芳	气候变化	李 燕	俄罗斯政治

任 琳	全球治理	丁 工	发展中国家政治
赵 洋	科研助理	刘 畅	科研助理
周 乐	科研助理		

联系人: 史明睿 邮箱: iwepceem@163.com 电话: (86)10-8519 5775 传真: (86)10-6512 6105

通讯地址: 北京 建国门内大街 5 号 1543 邮政编码: 100732

联系人: 许怡 邮箱: naonao0619@163.com 电话: (86)21-50815287 传真: (86) 21-50815265

通讯地址: 上海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1600 号 24 楼 2409 邮政编码: 200122

免责声明:

版权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和国际战略研究组所有, 未经版权所有人许可, 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上网和刊登, 如有违反, 版权所有人保留法律追责权利。《全球智库半月谈》所编译的文章, 仅反映原文作者的观点, 不代表编者、版权所有人或所属机构的观点。

目 录

世界热点

下任法国总统面临的任务 7

导读：近年来，席卷欧洲的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潮对欧盟的稳定带来了很大冲击。在第一轮法国总统大选中，就有超过 40% 的选民投给了两位支持脱离欧盟的候选人：极右翼的勒庞和极左翼的梅朗雄。那么，无论是马克龙或是勒庞，即将产生的新法国总统将如何处理法国与欧盟关系？都有哪些任务等待着他们去解决呢？

中美世界地位的龟兔赛跑 10

导读：近年来，中国的外交政策发生了一定转变，在海洋主权声索、国际治理、全球气候变化等问题上频频出招，引发各界的强烈关注。许多人都在问，中国是否在谋求争夺国际社会领导权，试图对美国发起挑战，取代其大国地位？2017 年 4 月出版的《经济学者》杂志发表评论，认为中国虽然近年来在外交事务上动作频繁，但中国并不急迫地谋求挑战美国。

从特朗普身上获益最多的不是俄罗斯，而是中国 17

导读：从长远来看，中国，而非俄罗斯，将获得最大的国际影响力。中国的目标是变成一个全球性超级力量，这一目标将通过向海外发展和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出力而实现，以上两点恰恰是特朗普总统的财政预算打算最大程度降低美国影响力的领域。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在不利的的外部环境下维持增长 20

导读：本文讲述了现今国际社会条件给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带来的不利影响，同时阐述了新兴经济体可以在逆境中维持增长的观点。

经济政策

数码时代下对贸易和创新的重新思考 22

导读：新制度经济学对交易成本的审查为经济政策和商业战略提供了新的视角。“开放创新”带来的益处需要与增加的交易成本进行权衡。数字化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但数码产品的专利会带来一系列的制度成本。面对全球化，我们需要注重国家利益，尤其是国家的规模和战略发挥重要作用。

政府质量与基础设施回报率 24

导读：本文的研究表明，通过修建造价昂贵的高速公路与核心城市建立联系，并不能有效的刺激本地的经济增长。但修建其它公路可以加强城市内部之间的联系，促进本地企业生

产率的提高。而且，政府的质量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因此，加强制度建设应该成为区域发展的首要任务。

特朗普政府对过于强势的美元重视不足 26

导读：作者认为全球宏观经济的恶化以及美元的强势给美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但新一届政府对此重视不够。为了阻止世界经济的进一步下滑以及美元的强势，新一届政府应该采取如下举措：第一，在处理国际经济关系，尤其是与中国和欧盟的关系时，应该采取温和的立场；第二，重新考虑降低税收，增加基础设施建设和国防支出的计划。避免美元的进一步上涨；第三，当制定国际经济政策时，政府应该与企业进行协调。

经济理论

关于宏观经济学的五类模型 28

导读：本文归纳了宏观经济学的五种模型：基础模型、DSGE（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政策模型（Simon Wren-Lewis 更喜欢称之为结构计量经济学模型）、玩具模型和预测模型。作者认为这五种模型都有其价值，模型之间是相互关联的，一种模型不见得比另一种更好。不同类型的模型有很多需要相互借鉴之处，并能从更多的互动中受益。

聚焦中国

投资者对中国银行业过度乐观 31

导读：中国银监会新任掌门人郭树清上任不久就面临着重重挑战。中国银行业近十年来信贷规模的飞速扩张造成了银行体系内的诸多隐患，但郭树清本人似乎依然充满信心。更让人意外的是，除了郭这样的政府官员，国际上不少投资者与评级机构亦对中国金融市场持乐观态度。本文作者认为，近年来中国名义经济增速的提高、中国商业银行的坏账冲销以及中国银行业的效率提升确实有利于中国银行业的稳定发展；但另一方面，中国银行业看似漂亮的资产负债表背后是包括“坏账银行”、“债转股”等一系列的金融运作，而这些金融运作最终无法避免地将债务重新塞回银行手中。

全球治理

G20 支持开放和包容的贸易投资体系的新举措 34

导读：在非同寻常的挑战面前，G20 在 2017 年应该更加努力，以维护目前的全球贸易和投资体系，包括在关注中期改革的前提下，建立有效的多边争端解决机制。G20 应该将关注点放在以下几个方面：1. 支持世贸组织 2. 时刻关注贸易和投资的多重后果 3. 改善 G20 在解决贸易保护主义方面的措施 4. 促进投资。

建立一个更具韧性和包容性的全球经济 35

导读：本文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干事拉加德于2017年4月12日在布勒哲尔研究所的讲演稿，载于IMF官网。

战略观察**美国与东盟：未来四十年关系展望 41**

导读：从成立至今，东盟已经走过了50个年头。在新时期，东盟发展面临诸多挑战。在近期召开的“美国-东盟未来四十年关系展望”的讨论会上，与会者就提高东盟凝聚力，制定美国的东盟政策，拓展经济效力，完善机制效力，实现互联互通和深化人员交流等方面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

前景坎坷的美中关系发展道路 44

导读：本月，习近平与特朗普在美国海湖庄园举行了第一次会晤。作者认为，虽然本次会晤顺利举行，双方达成了合作的共识，但是背后却是美中两国之间日益上升的对抗和竞争态势。双方分歧已经从具体事务扩展到了国际秩序和规则。作者认为，尽快找到协调分歧的新手段对于维护双边关系的稳定起着关键作用。

本期智库介绍 46

下任法国总统面临的任务

Richard Maher / 文 伊林甸甸 / 编译

导读：近年来，席卷欧洲的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潮对欧盟的稳定带来了很大冲击。在第一轮法国总统大选中，就有超过 40% 的选民投给了两位支持脱离欧盟的候选人：极右翼的勒庞和极左翼的梅朗雄。那么，无论是马克龙或是勒庞，即将产生的新法国总统将如何处理法国与欧盟关系？都有哪些任务等待着他们去解决呢？全文如下：

二十世纪中叶，在历经了几十年的战争、屠杀、经济危机和意识形态变换后，具有远见的欧洲国家领导人们终于意识到，他们那一代人必须担负起在欧洲实现经济和政治一体化的历史使命。正如欧共体的设计者之一让·莫内所言：“除非我们建立起新的秩序，否则战争的阴云将永远会在我们的头顶徘徊。”

此后的几十年间，欧洲国家的公民们普遍相信，欧洲的一体化是欧洲和平、稳定与繁荣的基石。在这种一体化共识的大背景下，欧洲一体化事业从当年那个仅局限于西欧六国的关税同盟，已经成长为了如今具有统一市场、开放边界和共同货币欧洲联盟，并且其地理范围也早已辐射到了昔日铁幕以东的国家。

然而，这种共识目前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挑战。蔓延在全欧洲范围内的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对欧洲一体化发起了有力的挑战，而欧陆中心的传统大国——法国，也不例外。

目前，法国总统大选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第一轮大选结果出炉后，人们普遍看好斩获了 24% 票数的中立派独立候选人埃马纽埃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如果他在 5 月 7 日的第二轮大选中继续保持优势，那他将得以击败极右翼国民阵线候选人勒庞，阻止她成为法国自 1940 年以来第一名极右翼总统的野心。

马克龙曾经是一名投资银行家，也曾在奥朗德内阁中担任经济部长。他表示，欧盟并没有造成法国近年来遭受的诸多不幸，恰恰相反，欧盟是解决法国遇到问题的良方之一。要知道，在如今法国政坛上活跃的政治家中，马克龙的这种观点堪称是相当激进了。马克龙还呼吁进一步推动法德关系，并且与德国携手合作，加强欧盟的团结。马克龙高度评价了德国总理默克尔，并且表示“默克尔愿意接纳困境中的难民，这捍卫了我们共同的信仰，也保护了我们同样的尊严。”

马克龙的这番表态令柏林的政治家们大大松了一口气，同样的，欧盟各个机构中的不少人也表示非常欢迎这一看法。此前，他们一直担心法国下任总统可能会动摇对欧盟的支持。如果真的如此，那将使得欧洲一体化的事业受到极大挫折。在第一轮大选结果出炉当天，欧元对美元的比价就冲上了五个月以来的最高点，这无疑反映了市场对马克龙态度的强烈支持。

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的是，在第一轮大选中，40%的选民还是将选票投给了两位对欧盟态度非常敌视的候选人——极右翼的勒庞和极左翼的梅朗雄。其中，梅朗雄在第一轮大选的后半段表现抢眼，并最终斩获了19.6%的选票。梅朗雄认为欧元是法国经济疲软的罪魁祸首，并呼吁法国退出欧盟。

勒庞多年以来都宣称自己当上总统后会重新调整法国与欧盟的关系。在2014年接受的一次采访中，勒庞表示：“我想要毁掉欧盟。”她认为欧盟对法国“极为有害”，同时是“一头反民主的怪兽”。与梅朗雄相比，勒庞对移民的态度也更加激进。梅朗雄认为移民对法国的经济有促进作用，而勒庞则宣称移民会威胁法国的文化和社会安全，同时也给国家带来了无法承受的负担。

不过，虽然梅朗雄对移民的态度相对温和，但他也认为现如今欧盟面对移民问题所采取的对策是极为不稳定的。他表示虽然欧盟已经建立起了欧元区，却没有建立起一个统一的、超国家的政治体系来支撑它，因此欧元区国家如果不采取重大改革，那欧元区几十年内一定会解体。梅朗雄呼吁欧洲国家建立统一的财政部，并且协商制定统一的年度预算。而对那些陷入危机的欧盟国家，欧盟也应当施以援手。不过，这一设想可能遭受德国的激烈反对，因为德国一向反对将“欧洲联盟”变成“欧洲转移支付联盟”，反对将劫富济贫作为欧盟的政策方针。

如今，法国的选民们面临着艰难的选择——马克龙和勒庞对欧盟的态度有着天壤之别。到底是投票给勒庞，并且期待着法国退出欧盟？还是投票给马克龙，并且支持法国更进一步地融入欧盟大家庭？5月7日，法国人民将做出选择。

尽管勒庞希望借着民粹主义的东风，在法国复制特朗普的胜选奇迹，但目前的主流观察家们还是预测马克龙将以20个百分点左右的优势在第二轮大选中胜出。目前，许多法国人依然相信国民阵线对于法国的核心价值观而言是一种威胁。而虽然不少法国人并不喜欢布鲁塞尔，但他们也没有下决心放弃欧元或者退出欧盟。调查显示，超过70%的法国人表示希望保留欧元。

欧盟在过去的十年间经受了前所未有的考验——包括经济停滞、对希腊多次的援助、难民危机、英国脱欧，以及民粹主义的崛起。值得注意的是，民粹主义直接威胁了欧盟存在的根基，这对于欧盟来说是致命的威胁。

如果马克龙如人们所预测的那样在5月7日成功击败勒庞，并且保留了法国在欧洲议会中的席位，那他将发现欧盟问题依然是一个处境不妙、四面楚歌的问题。因此，他将面临着说服法国公民继续留在欧盟的重大考验。为了通过这一考验，他必须团结全体的公民，这不仅仅包括法国的公民，也同样包括那些德国，葡萄牙，希腊和意大利的公民们。

本文原题为“The Task Awaiting France’s Next President”。本文作者 Richard Maher 是欧盟大学研究院（European University Institute, EUI）全球治理项目的研究员。本文于 2017 年 4 月刊于 CIGI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中美世界地位的龟兔赛跑

《经济学人》评论 / 文 张舜栋 / 编译

导读：近年来，中国的外交政策发生了一定转变，在海洋主权声索、国际治理、全球气候变化等问题上频频出招，引发各界的强烈关注。许多人都在问，中国是否在谋求争夺国际社会领导权，试图对美国发起挑战，取代其大国地位？2017年4月出版的《经济学人》杂志发表评论，认为中国虽然近年来在外交事务上动作频繁，但中国并不急迫地谋求挑战美国。全文如下：

特朗普总统正在准备于下周与习近平主席进行第一次当面会谈，而与此同时，中美两国也在重新评估各自的国际定位。有趣的是，美国希望在多个方面推卸自己的国际责任，而中国则恰恰相反。从某种程度上讲，特朗普政府像是龟兔赛跑中的兔子，急不可耐地从一个政策跳到另一个政策，有时甚至会与自己先前的立场自相矛盾。而中国则像是寓言中的乌龟，谨慎地审时度势，并且采取谨慎而缓慢的步伐达成自己的目标。这场赛跑的结局会如何呢？几千年前的伊索就已经在他的寓言故事里告诉我们了。

如今，中国正在修改其先前坚持的外交政策。此前，中国一直奉行邓小平在1992年提出的“韬光养晦”战略。这个转变是从2010年开始初现端倪的，当时有中国官员提出，中国要在外交问题上“积极有为”。而在今年1月，当习近平主席在达沃斯论坛上发表演讲，提出“中国要引领世界全球化的进程”时，这种外交政策的转变就显得更加明确了。北京外交界的观察人士指出，习近平发言的初稿更多关注的是中国的国内经济，这是一个基本不具争议性的主题，也是中国领导人在海外常见的演讲主题。据称，习近平本人否决了这份初稿，并召集了国际关系方面的专家，起草了更多关注中国在世界舞台上角色的内容。无论这个传闻是否属实，习近平主席的演讲无论是在语气、主题还是内容上都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

次日，习近平在日内瓦发表的讲话则进一步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他在讲话中举了一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例子，并且用一个希腊的典故委婉地警告了美国：在古希腊，主导地区局势的城邦斯巴达没有妥善处理好与新兴城邦雅典的关系，并最终丧失了主导地位。二月份，在北京召开的一次会议中，习近平指出中国要“引导国际社会建立更加公正、理性的世界秩序”。而在此之前，习近平仅仅是表示中国要在建立这样的世界秩序的事业里扮演一定的角色。

有一段时间，美国曾迫切希望中国能站出来，承担自己的国际责任。2005年，时任美国副国务卿的佐利克就要求中国做国际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不过中国并没有做出什么回应。后来，在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北京曾经有

过一阵热烈的探讨，来讨论所谓“中国模式”和“北京共识”，这被认为是“华盛顿共识”的一个替代品。但是，北京并没有表示“中国模式”应该被推广到其他国家，而仅仅是表示“北京共识”是对“华盛顿共识”的一个补充，世界上并不存在有普适的一套解决方案。那么，如今北京是否有更多的想法？中国是否正在试图挑战美国的国际领导地位？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要了解中国政府政策制定的套路。在中国，新的政策构想很少会明确地出现在领导讲话中。中国政府更喜欢只在讲话中提出模棱两可的大方向，从而给自己更大的回旋空间。而当他们希望进一步推动政策落实时，他们会逐步释放类似的信号，并且在国家控制的媒体内进行有限的讨论，从而试探各界的反应。而就外交政策这个问题来说，这一切已经开始了。

就在习近平达沃斯和日内瓦讲话后不久，李克强总理向全国人大做了年度政府工作报告。这份报告罕见地 13 次提到“全球”或“全球化”，而去年的报告则仅仅提了 5 次。（见图 1）



Economist.com

图 1 中国历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及“全球”或“全球化”的次数

正如以往那样，中国的媒体们开始高密度地报道总理的讲话。他们把总理的报告总结为一套中国方案，不同于过去那个旧的“北京共识”，这次中国希望将这套方案推向全球。所谓的“中国方案”，最早出现在去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的讲话中，习近平在讲话中提出：“中国有信心为全人类建立更美好的制度安排提供中国方案”。此后，“中国方案”这个词立即引发关注。据百度搜索数据显示，“中国方案”这个词的检索数据高达 2200 万条。

还没有人具体地定义什么是“中国方案”，但看起来这似乎是一套万能方案。加强全球治理？《人民日报》指出，“中国方案”完全可以为加强全球治理提供解决方案。解决气候变化问题？谢振华在《南方都市报》上指出，“我们即将为世界提供气候变化问题的中国对策。”同时，《学习时报》也指出，中国方案可以为世界展示如何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与先前的“北京共识”有显著区别的是，

中国在 2008 年总结的共识似乎只适用于发展中国家，而如今这套“中国方案”，则是世界性的，也包括西方发达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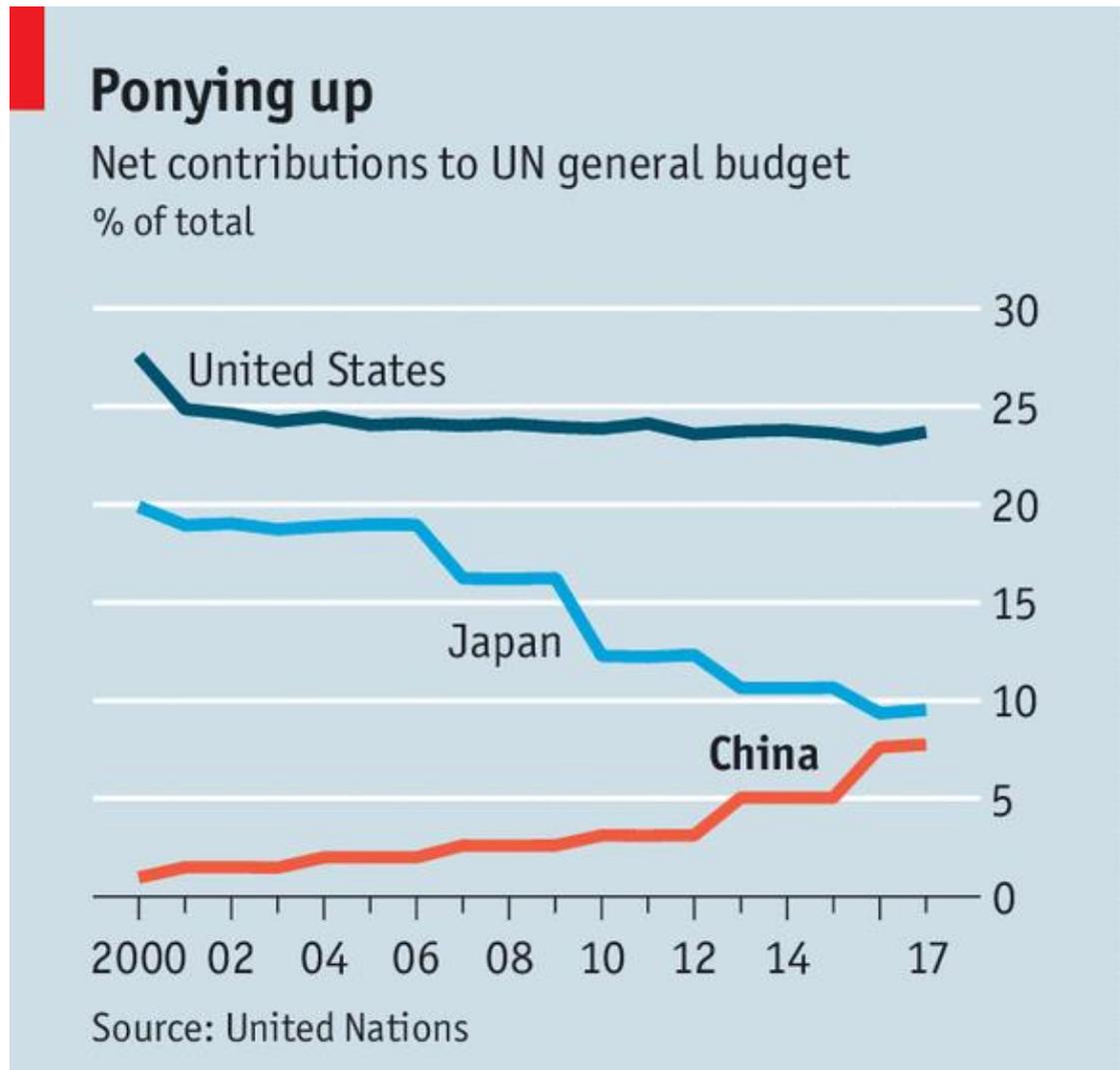
这件事当然是有标志性意义的。中国的领导人此前从未如此高调地推销过“中国模式”。在这以前，热衷于推销“中国模式”的主要是中国的学者。在很久以前，邓小平就告诫过加纳总统：“不要亦步亦趋地模仿中国模式”。许多中国政府的官员也不愿意高调谈论“中国方案”，因为这可能违反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但相反地，如今习近平主席本人高调地为“中国方案”背书，而李克强总理则把它写进了自己的工作报告。看来，中国现在对于推广自己的经验显得更加自信洒脱。

这不仅反映了中国决策层对于在国际舞台上有所作为的决心，也体现了中国日益增长的信心。中国的信心部分来自于其近年来在外交事务上的成就。去年，国际法庭就南海的主权声索问题做出了对中国不利的裁决，然而，中国迅速对菲律宾展开了积极地游说，并且以巨额投资为交换使得菲律宾低调地放弃了原本到手的诉讼胜利，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其他国家，如马来西亚上。中国的领导人由此认为，尽管有国际法庭的不利裁决，2016 年对于中国而言依然是在南海问题上凯歌高奏的一年。

当然，说到中国的外交成就，自然少不了习近平主席雄心勃勃的“一带一路”战略，这个战略意图沿着中国和欧洲之间的古丝绸之路在基础设施建设上进行大量投资。仅去年一年，“一带一路”战略下签署的基础设施建设合同就已达 10 亿美元，对于一个 2013 年才提出的战略来说，这个成绩算是相当好了。另外，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 60 多个国家的出口总额已经有望超过对美出口的规模。今年 5 月，习近平主席将主持召开一次国际峰会，意图进一步将这一事业推向前进，并使之终有一日成为与跨大西洋贸易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国际贸易体系。

但是，需要明确的是，提出“中国引领全球化”和“中国方案”的概念，并不意味着中国要完全背离现有的国际秩序，并且挑战美国的国际地位。中国在国际事务上奉行的是改良主义路线，它不谋求做推翻一切的革命者，也不试图成为篡夺全球领导地位的僭越者。

中国是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全世界第三大联合国会费赞助国，也是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联合国维和行动资助国。（见图 2）去年，中国还在杭州召开了 G20 峰会。另外，中国最近还成功使得人民币被 IMF 接纳为其五大储备货币之一。中国主导建立了两个国际金融机构——亚投行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如此看来，习近平主席无疑是要下一番大力气，来在国际秩序上塑造中国影响。



Economist.com

图2 美、日、中三国对联合国总预算的贡献比

中国正在越来越积极地参与联合国事务，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在试图支配联合国的事务。前不久，中国积极响应，而非发起了对北朝鲜的制裁。同时，尽管中国在国内有相当多的反恐行动，它却对于联合国框架内对伊斯兰国的国际联合打击兴趣寥寥。对于习近平主席而言，他在国际舞台上的雄心也受制于国内的一些约束。比如说，中国的官僚体系就对决策层外交战略的转变抱有抵触情绪。最近中国外长王毅在出访澳大利亚时就表示：“中国无意领导任何人”。当然，王毅并没有在和习近平唱反调，不过王毅的这番表态显然也没有做到与习近平主席步调一致。

那么，同时表现出雄心勃勃和谦虚内敛这两种特性的中国，究竟会做出什么举动呢？我们可以参照中国过去在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的行为。早在2008年，

中国是当时国际气候协定签署的主要阻力来源。然而时过境迁，今天中国早已习惯于把全球气候变化的问题挂在嘴边，并且积极开展与气候变化议题相关的中式外交。2016年的巴黎气候协定当中重要的一部分内容，就是来源于习近平与奥巴马先前达成的协定。中国也帮助在国际上确立了“共同但有差异的责任”这一全球气候政策的基本原则，也就是说各国应该认领自己在减少碳排放问题上各异的任务量。

在去年的G20峰会上，习近平主席曾多次强调要将气候变化问题作为大会讨论的主要议题。不过，当时的大背景是中美之间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已经达成多项共识。而如今，特朗普总统却推翻了奥巴马任上通过的多项环保政策。绿色和平组织的Li Shou认为，中国已经做好了领导世界各国协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准备。正如中国的谢振华所言，气候变化问题可能是“中国方案”所致力于解决的第一个问题。

在习近平主席的达沃斯讲话后不久，中国外交部国际经济司司长张军接受了香港媒体的采访，并对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定位的变化发表了看法，他说：“中国并没有急于在国际上出头，但是国际上原先的领跑者率先退缩，这才使得中国显得比原先的位置更靠前了些。如果国际社会真的要求中国扮演世界的领导角色，那中国也一定会承担起对应的责任。”

本文原题为“Tortoise v hare: Is China challenging the United States for global leadership?”。

本文为《经济学人》于2017年4月1日发表的评论，原文刊于《经济学人》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从特朗普身上获益最多的不是俄罗斯，而是中国

Erol Yayboke /文 史明睿/编译

导读：从长远来看，中国，而非俄罗斯，将获得最大的国际影响力。中国的目标是变成一个全球性超级力量，这一目标将通过向海外发展和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出力而实现，以上两点恰恰是特朗普总统的财政预算打算最大程度降低美国影响力的领域。编译如下：

俄罗斯以冷战之后从没见过的方式主导着我们的新闻头条。报道称，俄罗斯与特朗普选举有关联，克林姆林宫批准干预美国 2016 年大选，现任政府沉默对待弗拉基米尔·普京镇压反腐败示威者，现任政府与危险且虚假的共产主义宣传进行非法等价交换。在这些舆论包围下，人们很容易认为俄罗斯会从特朗普当选总统中获益最大。

然而，这是错误的。中国可以从两处受益，收获最丰。

如果国会通过特朗普总统的财政预算蓝图，美国将放弃其在自由国际秩序下的义务，这一做法将为中国的机会主义提供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中国将取代美国成为全球贸易的领导者，美国本可以凭借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加强地区贸易，但特朗普总统放弃了这一机会，并将其送给了中国。中国渴望更多的国际影响力已不是秘密，在某种程度上，这也一直受到美国领导层的高度关注。但到现在，这一问题发生了转变。

竞选时期，特朗普对抗中国，但自他当选以来，他已经习惯于规避明确的地缘政治秩序。尽管还存在着一些不那么微妙的军事暗示和国营媒体强硬的谴责，中国正逐渐清楚如何影响一个不可预测的新政府。他们已经发现，在无数事物中，Jared Kushner 才是海湖庄园和特朗普议程的“守门员”。特朗普政府缺乏经验，总统本人奉行自己过度简化后的“us vs. them”交易世界观，而中国的外交官、商界人士和党的官员（更不用说间谍）正在寻找方法来利用这些获利。

然而，中国的长期胜利将来自于影响全球议程的潜力，特别是在气候变化和经济发展方面。

中国准备成为气候变化的全球领导者，这应该是历史上最令人震撼的角色逆转之一。美国在技术上仍然是“巴黎气候协议”的签署国，但特朗普总统摧毁奥巴马政府制定的大部分监督框架并大幅缩减环境保护署开支后，美国已很难实现碳排放目标。

地缘政治领导层对气候变化的持续转变是混乱的，白宫和国会中没有几位共和党人想要接受广泛承认的气候科学。中国有足够的空间承担起环境变化方面的全球领导角色。

当讨论转向国际发展和国际自由秩序中中美两国的角色时，类似的现象仍然存在。

迄今为止，美国一直是国际援助和发展的主要参与者。尽管美国对外援助总额占国民收入比例低于其他高收入国家，但以实际美元计算的情况下，美国对外援助额是排名第二国家的两倍。大量的资金带来巨大的力量和影响力。美国对世界银行行长有不成文的“权利”。美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联合国中几个高级职位（如世界粮食计划署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总干事）按惯例由美国籍人员担任。大量的资金输入这些国际组织，使得不论美国两党哪一个执政，都能获得不断扩大的全球影响力。

在特朗普的“让美国再次伟大的预算蓝图”中，特朗普政府可能使美国丧失全球领袖地位。并且，这种做法为中国填补美国在国际事务上减少的 28% 开支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为了这一特定的利益，中国定会指示国务院工作人员“为联合国项目寻求 50% 以上的开支缩减”；中国也十分可能对美国减少世界银行 6 亿 5 千万资金支持非常感兴趣。

当领导这些组织中的一个或多个时，中国就能对国际合法性和国际力量产生有效影响。如果美国没有履行义务，中国有能力（也可能有意愿）支付这个特权。

伴随过去 50 年中国人口和经济的增长，中国已开始放眼于寻求海外自然资源、商机和影响力。尽管一些驳斥中国的说法认为中国是“过于负责”，但中国给世界带来的影响是不可否认的。为了追求国家资源、地缘政治合法性和商品输出市场，中国正在本着互利互惠的原则创造强有力的盟友，以达到实现以上三个目标所必需的稳定。

例如，非洲政府“通常视中国参与是积极的”，并且非洲持有“对中国普遍积极的看法”。非洲虽然不是中国仅有的地区利益，但近期中国在非洲大陆的软实力确有发展。2014 年，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非洲签署了价值超过 900 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建设合同（相比之下，同年美国仅花费 350 亿美元用于全球援助）。从 20 世纪 70 年代连接赞比亚和坦桑尼亚的 TAZARA 铁路，到最近刚在亚的斯亚贝巴建成的捷运铁路（即地铁）系统，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已经“扭曲”了美国在非洲的影响力。

国际组织组成了自由国际秩序。下一步，北京方面寻求其全球领导力的方式将变为在国际组织中寻求领导地位，正如美国和世界银行的关系一样。多亏了特朗普总统，中国正好需要这些。

本文原题为“The Country with the Most to Gain from Trump is not Russia; It’s China”。
本文作者 Erol Yayboke 是美国领导力发展项目（USLD）和 CSIS 繁荣与发展项目（PPD）
研究员。本文于 2017 年 4 月刊于 CSIS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在不利的的外部环境下维持增长

Bertrand Gruss, Malhar Nabar, and Marcos Poplawski-Ribeiro /文

导读：本文讲述了现今国际社会条件给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带来的不利影响，同时阐述了新兴经济体可以在逆境中维持增长的观点。编译如下：

此时此刻，你很有可能正通过一部在新兴市场经济体组装的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阅读这篇文章。你的身旁可能摆放着产于斯里兰卡或肯尼亚的茶。而且，你也许正坐在或即将坐上前往上海、圣保罗或圣彼得堡的飞机。

此类情形不胜枚举。但是，即便只是透过我们周围的几个例子，也可以轻易发现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如今在全球经济方方面面发挥的作用，随着时间推移，这种作用变得愈发重要。

过去二十年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完善了政策框架，实施了结构性改革，这对上述转变至关重要。但是，正如我们在 2017 年 4 月《世界经济展望》第二章的研究所显示，外部环境在促进其崛起方面也发挥着作用。

这些经济体当下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可能比它们最近几十年已经习以为常的外部环境更加复杂。然而，它们仍然可以通过采用正确的政策组合和继续加强体制框架的方式，从不利的条件中获取更大的增长动力。

外部环境的作用

目前，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占到全球经济增长的近 80%，这一份额几乎是二十年前的两倍。它们对于全球经济的意义并不仅仅是生产中心或者负责打包货物并运往发达经济体的贸易枢纽。此外，它们作为消费品和服务的最终目的国的重要性也日益增加，现已占全球消费增长的近 85%，这一份额是其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份额的两倍多。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这些经济体已进一步融入了全球贸易体系和国际资本市场。随着这一过程的推进，它们的进出口相对价格、外部需求，特别是外部金融状况，越来越多地影响到它们的实际人均收入增长。

例如，我们的研究发现，相比 1995 年至 2004 年这一时期，从 2005 年开始，人均收入平均增长率提高的 1.5 个百分点中大约三分之一可以归功于资本流入的增加。久而久之，对其他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出口的需求也对这些经济体的中期增长产生了更为强大的作用力。

在这些数字背后，外部环境已经影响到这些国家增长过程的性质。这些经济体中有几个过去经历了增长率不断变化的增长加速和逆转阶段。这些阶段似乎对

人均收入水平具有长期影响。本章认为，有利的外部环境会提高增长加速和逆转减少的可能性。

较复杂外部环境下的增长

在 2000 年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外部环境特别有利——外部需求旺盛、资本流入相对充足，以及大宗商品价格上扬。

然而过去几年里，这些经济体面临的外部环境变得越来越复杂。发达经济体在经历危机后复苏进程缓慢，削弱了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出口的需求。中国通过再平衡调整使经济转向消费和服务业，减少了对大宗商品进口的依赖。自 2014 年起，更广泛而言，大宗商品周期出现拐点，降低了大宗商品出口国的增长率。

外部环境的部分转变可能会持续下去。混杂其中的额外因素是发达经济体实行保护主义的风险以及外部金融状况随着美国货币政策正常化而普遍收紧的状况。因此，相比过去，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从外部环境中获得的增长动力可能会减弱。

趋同的空间

尽管环境更为复杂，但是该章的分析认为，这些经济体仍然能够通过加强自身的体制框架、保护贸易一体化、允许实行灵活汇率以及控制高水平的经常账户逆差和大规模的公共债务所导致的脆弱性等措施，充分利用外部环境提供的较弱的增长动力。

上述部分政策还直接有助于促进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长，而无论外部环境如何转变。毕竟这一组国家中 90% 的国家人均收入水平不到美国的一半，实现追赶型增长和趋同的空间依然很大。

本文原题为“Emerging Markets and Developing Economies: Sustaining Growth in a Less Supportive External Environment”。本文作者 Bertrand Gruss 是基金组织研究部世界经济研究处的经济学家；Malhar Nabar 是基金组织研究部世界经济研究处的副处长；Marcos Poplawski-Ribeiro 是基金组织研究部世界经济研究处的经济学家。本文于 2017 年 4 月刊于 IMF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数码时代下对贸易和创新的重新思考

Brian Kahin /文 郭子睿/编译

导读：新制度经济学对交易成本的审查为经济政策和商业战略提供了新的视角。“开放创新”带来的益处需要与增加的交易成本进行权衡。数字化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但数码产品的专利会带来一系列的制度成本。面对全球化，我们需要注重国家利益，尤其是国家的规模和战略发挥重要作用。编译如下：

制度的重要性已经得到广泛的认可，新制度经济学也成为了炙手可热的学术研究领域。新制度经济学强调企业层面的关系和决策，而不是传统主流经济学关注统计意义上的加总。新制度经济学主要分析交易成本，包括实际生产中的交付货，信任，风险以及维修等成本。这是一个漫长而且不断变化的过程，尤其是存在较长的供应链和不断变化的外界环境时。因此，衍生出一个经典问题：当企业有需求时，应该是自己生产以降低交易成本还是去市场上寻找供给者？

跨境交易

当存在跨境交易时，上述问题转化为是在本国生产还是去外国生产，相应的供应链也就变成全球价值链。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关税、运输以及沟通等硬性成本已经降低。国际贸易是经济学一个成熟的分支，规模经济和比较优势发挥主导作用。不像新制度经济学，贸易是可见可测的，跨境也是容易定义的。是否进行贸易的影响因素，如法律体系、政治稳定、腐败信任等，都是容易调查的。

与全球价值链相对应的思想是“开放创新”，认为创新不应该局限于本国的研发，而是要充分利用国外的先进知识和技术。但只在公司内部创新也有优势，一切事情都有章可循、过程和环节可控。创新的核心在于建立一个制度框架，这可以较好的说明制度和交易的关系。专利可以排他，但不能阻碍技术的传播。当专利无处不在时，就像在数码领域，评估其所有权和执照也将变得非常困难。

数字化

数字技术不仅仅是一个技术创新的领域，它会渗透到整个经济中，在降低交易成本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如搜寻成本、通讯成本、广告成本等方面。互联网技术为全球化提供一个广泛的平台，有助于规模经济优势的发挥。基于领土存在的壁垒导致的成本依然存在，但专利、税收竞争法、消费者保护、隐私法等成本都已经大大降低。

像制度经济学的成本分析，数字化和全球化从微观企业层面和宏观国家层面共同发挥着作用。数字化挑战着标准的经济测量，并提出统计上错过了什么附加值。数字化通过展示如何在消费者服务、成千上百万的虚拟商店、资源共享平台等领域降低交易成本来证实成本交易的重要性。

数字化已经创造了新的创新模式，该模式特别适合生产成本和进入壁垒特别低，并可以迅速传播和应用的领域。著名的例子包括因特网、万维网、软件开发和开源。在这些情况下，某些业务模式和人力资本的结合，可以成为“无许可证”的创新，而且搜索成本、谈判等几乎都可以消除。

降低交易成本，生产和行业进入都是相互强化的。通过个人用户的论坛评论、邮件列表、博客和维基也可以降低评估成本。智能手机平台可以使用应用程序编程接口和软件开发工具进行 APP 的开发。云服务通过削减对软件和硬件的投资降低了小企业的进入壁垒。数字化会带来很多交易便利，如点击成为喜欢的信号，免费试用软件以及感受很多其它美好的东西。

新制度经济学

数字化在降低贸易壁垒，支持跨境交易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当前的制度环境已经不仅仅由本国的政治法律决定，更多的却决于全球化的政治经济。包括很多的国际机构，如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贸易协定，一些地缘政治，全球价值链、免签证旅行、移民等都依赖互联网。

还有另外一个变化：吸引了数以百万计用户的互联网平台已经成为一个机构，他们管理市场、执行政策、塑造经济交流和社会互动。他们已经成为世界上最有价值的公司，并且拥有自己的信仰。不像全球化，数字化不会引起政治反应，即便是外国的互联网巨头也是如此。

那么，在这样一个不熟悉的环境里，一个中型的国家应该如何制定本国的国际战略？它是否可以回答数字不平等的难题？传统的智慧是云服务，开源软件，这会为数十亿美元的独角兽提供温床，独角兽是否常见？Facebook 是最后的巨人吗？

作者提出如下建议：第一，降低交易成本。城市以及社区都要降低人们的互动成本，尤其是知识交换的成本；第二，利用机遇。在国家战略上利用当前的环境机遇，也要充分发挥本土的文化优势；第三，去实验，将经历与别人分享；第四，反思贸易和创新政策。

本文原题为“Is Facebook the Last of the Giants? Rethinking Trade and Innovation for the Digital Age”。本文作者 Brian Kahin 是一位数码经济研究专家。本文于 2017 年 4 月刊于国际治理研究中心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政府质量与基础设施回报率

Riccardo Crescenzi, Marco Di Cataldo, Andrés Rodríguez-Pose /文 谢晨月/编译

导读：本文的研究表明，通过修建造价昂贵的高速公路与核心城市建立联系，并不能有效的刺激本地的经济增长。但修建其它公路可以加强城市内部之间的联系，促进本地企业生产率的提高。而且，政府的质量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因此，加强制度建设应该成为区域发展的首要任务。编译如下：

基础设施投资一直是欧盟、美国以及一些新兴市场国家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抓手。2009年奥巴马的经济刺激方案中非常重视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现在特朗普总统也把基础设施投资作为自己的核心政策。世界银行也督促欠发达地区和城市进行基础设施投资。事实上，学者的研究认为较低水平的交通基础设施投资有助于经济活动降低生产成本，改善不同地区之间的服务，提高生产率。一旦基础设施投资超过某一门限值，额外的基础设施投资的经济影响就是不确定性的。OECD的研究表明几乎所有成员国的交通基础设施投资超过了门限值，额外的道路建设投资的经济效应是有限的。

政府质量和基础设施投资

交通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缺乏清晰的联系，这可能是由于新增的基础设施投资的回报率受到政府质量的影响。毕竟大多数基础设施投资的选择、设计和实现都是由政府完成的。政治和制度因素会在每一个阶段影响基础设施的回报率，从计划到项目选择以及具体的执行。基础设施投资需要较大的预算，存在大量的信息不对称和道德风险问题，这都决定了需要政府的干预。虽然交通基础设施投资的出发点是经济效应，但如何分配公共资源实际上经常受到个人追求政治连任的影响。

本文我们研究了欧洲不同地区政府质量和不同类型基础设施回报率之间的关系。我们利用欧洲统计局对道路的统计，分为高速公路和其它道路。高速公路造价昂贵，用于连接不同核心城市；其它道路用于连接同一城市不同地区，不会像高速公路那样引起中心辐射效应。

数据表明，伊比利亚半岛国家的高速公路增加最多。高速公路改善最多的是荷兰、瑞典、波兰、罗马尼亚、法国中部，中部和南部意大利。有趣的是，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并不是基础设施投资改善最多的地区。进一步的实证分析表明：第一，经济增长和不同类型道路投资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或者较弱的相关性；第二，政府质量和区域的经济表现存在很强的相关性；第三，高速公路投资 and 经济增长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性，即便是由质量较高政府主导的投资；第四，其它

公路投资只有由较高质量的政府主导投资才显示与区域经济增长有较强的相关性。

政策意义

文中的结果挑战了传统观点：欧洲欠发达地区可以通过修建造价昂贵的高速公路与核心城市建立联系，从而可以刺激经济的增长。事实上，恰恰相反，修建其它公路可以加强城市内部之间的联系，促进本地企业生产率的提高。但是，政府的质量起到关键性的作用。这意味着制度建设需要成为区域发展的首要任务。限制由于政治腐败或者政治利益导致公共资源分配扭曲的方法就是在项目的选择、设计以及评估等程序上设立严格的程序，引导政府投资具有盈利前景的项目。区域质量较差的政府需要加强对项目的监控，在整个项目周期内，加强与中央政府的协调合作。

本文原题为“Government quality and the economic returns of transport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本文作者 Riccardo Crescenzi 为伦敦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Marco Di Cataldo 为伦敦经济学院的博士后，Andrés Rodríguez-Pose 为伦敦经济学院的经济学教授。本文于 2017 年 4 月刊于 VOX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特朗普政府对过于强势的美元重视不足

Ryan Nabil /文 谢晨月/编译

导读: 作者认为全球宏观经济的恶化以及美元的强势给美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 但新一届政府对此重视不够。为了阻止世界经济的进一步下滑以及美元的强势, 新一届政府应该采取如下举措: 第一, 在处理国际经济关系, 尤其是与中国和欧盟的关系时, 应该采取温和的立场; 第二, 重新考虑降低税收, 增加基础设施建设和国防支出的计划。避免美元的进一步上涨; 第三, 当制定国际经济政策时, 政府应该与企业进行协调。编译如下:

尽管世界经济对于美国经济增长越来越重要, 但新一届政府似乎对全球经济以及过于强势的美元关注不够。新一届政府把美国利益放在首位。但是为了更好的推动美国商业活动和发展经济, 政府需要更加关注全球经济的发展和强势美元。

根据福布斯统计, 30%的美国标普 500 的企业一半以上的利润源于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欧盟和日本, 作为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 其经济的放缓以及美元的不断强势, 会降低美国海外投资活动的利润。美国的公司也越来越担心, 他们认为收入和利润下降的主要因素是全球经济环境和强势美元。

由于欧洲经济的疲软以及美元的强势, 可口可乐公司去年收入下降 5.9%。宝洁的销售收入 60% 来源于海外, 去年也下降了 8.2%, 他们担忧随着全球宏观经济的恶化以及美元的进一步强势, 他们的销售还会进一步的下滑。其中, 中国经济的下滑更令他们担忧。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 中国经济出现不可持续的泡沫, 中国经济在未来一定会进一步的恶化。根据 IMF 的估计, 到 2020 年, 中国经济增速会下降到 6% 以下。

尽管有人认为中国经济下滑给美国经济带来的直接风险有限, 但他们忘记了中国对全球经济的贡献。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经济贡献了全球增长的 30%。中国经济的进一步下滑不可避免的会对全球经济带来深远影响, 这会间接的影响美国的海外商业活动。

除了中国经济的下滑, 欧洲的发展也同样让人担心。民粹主义在整个欧洲大陆蔓延, 支持欧元区一体化的声音越来越弱。当然最令人担忧的是意大利的银行业, 不良贷款占整个银行贷款的 18%。意大利作为欧元区的第三大经济体, 银行业危机重重、政府债务高企以及政治体制失调, 给欧元区带来重大的挑战。

考虑到全球经济对美国企业的威胁, 新一届政府应该采取一系列措施阻止世界经济的进一步下滑以及美元的强势。首先, 政府在处理国际经济关系, 尤其是与中国和欧盟的关系时, 应该采取温和的立场。这可以鼓励面对经济不确定性的投资者的信心。目前, 新一届政府就贸易问题对中国采取了温和的态度, 这是正确的。第二, 新一届政府应该重新考虑降低税收, 增加基础设施建设和国防支出

的计划。因为这些计划可能会推动美元的进一步上涨。第三，新一届政府需要关注美国商业企业的担忧。当制定国际经济政策时，政府应该与企业进行协调。毕竟，面对政治金融的不确定以及不断下滑的全球经济，企业和工人才是最受影响的群体。

本文原题为“Dollar Don'ts-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isn't paying enough attention to undue strengthening of the dollar”。本文作者 Ryan Nabil 是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的研究员。本文于 2017 年 4 月刊于 AEI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关于宏观经济学的五类模型

Olivier Blanchard /文 杨茜/编译

导读：本文归纳了宏观经济学的五种模型：基础模型、DSGE（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政策模型（Simon Wren-Lewis 更喜欢称之为结构计量经济学模型）、玩具模型和预测模型。作者认为这五种模型都有其价值，模型之间是相互关联的，一种模型不见得比另一种更好。不同类型的模型有很多需要相互借鉴之处，并能从更多的互动中受益。编译如下：

Rudi Dornbusch 曾给我一个非常好的建议：永远不要谈论方法论，做好就行。但现在，我决定不避讳这点，谈一下方法论。

David Vines 主持了关于 DSGEs（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课题，这篇文章的主要写作原因和背景是探讨 DSGEs 在危机中的表现以及如何进一步改进这一模型。关于这个话题，我曾撰写三篇文章进行讨论。我本以为关于这个话题的讨论已然完结，但 David 组织了一个为期一天的会议，我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直接促使我又写了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有一个简单的主题：我们需要不同类型的宏观模型。一种模型不见得比另一种更好，每一种模型都有其价值，模型之间是相互关联的。如果这个命题被广泛接受，那么关于哪个模型更为重要的争吵就可以消失，但现实并非如此。

在这里，我尝试运用类型学去区分五种模型。（我个人只讨论一般均衡模型。然而，在宏观经济学中，大多数情况下要先选取一部分内容，构建此部分的均衡模型，然后带入相应的微观经验数据和宏观数据进行检验，随后建立一般均衡模型。）十分抱歉，为达到区分的目的，我需要重复以前文章中写过的内容。

基础模型。这些模型的目的是为了形成一个深刻的理论观点，而不是貌似紧密地追踪现实。这样的模型可能与几乎所有的宏观模型相关。Paul Samuelson 的消费贷款模型，Peter Diamond 的世代交叠模型，Ed Prescott 的股权溢价模型，Diamond、Mortensen 和 Pissarides 的搜索模型，以及 Neil Wallace 或 Randy Wright 的货币模型，均属于这一类。

DSGE（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这些模型的目的是探讨扭曲或一系列扭曲的宏观影响。为了进行有成效的讨论，这种模型必须围绕一个基本上共同认可的核心建立，在模型的基础上探讨其他扭曲，如有限理性、信息不对称、不同形式的异质性等。

这就是 David Vines（及其他许多人）在课题刚开始时批评的模型，在目前的研究中，他们提出了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核心模型应该是什么。目前的核心模型似乎不太符合现实的需要，它们大多由 RBC（实际经济周期）结构再加上一个扭曲的条件组成，名义

刚性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证。消费者的欧拉方程和价格制定者的定价方程都与理性预期理论相结合，它们过于强调经济代理人的看法。我认为，核心模型必须具有名义刚性、有限理性和有限的视野，不完全的市场和债务影响。我和许多人都曾在其他地方讨论过这些问题，在这里我不会继续讨论。

第二个问题是这些模型应该如何接近现实。我的观点是，模型的目标应该是接近现实，但不应通过特设的补充和修改达到目标，例如无现实依据的高阶成本模型只提供更接近现实的滞后结构。我下面要提到的政策模型才是密切联系现实的模型。

政策模型（Simon Wren-Lewis 更喜欢称之为结构计量经济学模型）。这些模型的目的是帮助设计政策，研究特定冲击的动态效应和探讨可替代的政策。例如：如果中国经济放缓，会对拉丁美洲有怎样的影响？如果特朗普政府开始财政扩张，对其他国家会有什么影响？

对于这些模型，拟合数据和捕获实际动态显然是至关重要的。但是，该模型也具有足够的理论结构，可用于跟踪冲击和政策的影响。双重目标意味着理论结构必须比 DSGEs 更加宽松：聚合和异质性导致更复杂的总体动态性，这不是严格的理论模型可以捕获的。旧式的政策模型从理论出发，运用数据构造方程。一些新型的模型从 DSGE 模型入手，通过数据确定动态关系。联邦储备委员会使用的主要模型之一，FRB / US 模型，使用理论来限制长期关系，然后允许潜在的高阶调整成本来适应动态的数据。我怀疑这种限制动态变化的方法是否是最好的方法，因为我不知道这种方法在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上能得到什么具体结果。

玩具模型。在这里，我想到了 IS-LM 模型、蒙代尔-弗莱明模型、RBC 模型和新凯恩斯模型的多种变化。如上述模型所示，有些可能仅仅基于理论，有些可能更加明确，但他们都有相同的目标。这类模型允许快速略过某些问题，或者从更复杂的模型中呈现答案的本质。对于研究人员来说，结果可能会在编写精细的模型之前，或者之后呈现，一旦模型完成，结果就可以检验出来。

这些模型有多接近正式的理论并不是衡量模型的标准。对于诸如 Robert Mundell 或 Rudi Dornbusch 这样的大师来说，他们有能力正确使用这些模型，这也是他们能够主宰本科宏观经济教科书的原因：并不是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是天才艺术家，他们像教学设备一样工作，把科学与艺术融为一炉。这些艺术依然极具价值。

预测模型。这些模型的目的是给出最好的预测，而这也是唯一的评判标准。如果理论有助于改善预测，那么就应该使用这个理论。如果不是，则应该被忽略。我认为判断的标准是理论在多大程度上帮助了预测。这个问题是统计学上的，从如何处理过度参数化到如何处理基础关系的不稳定性，等等。

总而言之：我们需要不同的模型来实现不同的目标，不能说这种模型比那种模型更好。我不认为，DSGE 是好的政策模型，除非它对理论的约束更加宽松。同样，我不认为 DSGE 是好的预测模型。这就是说，不同类型的模型有很多需要相互借鉴之处，并能从更多的互动中受益。旧式政策模型将受益于一些 DSGEs 模型中对异质性、流动性的约束。重复最初的观点，所有模型都应该建立在部分均衡基础和经验证据的基础之上。

本文原题为“On the Need for (At Least) Five Classes of Macro Models”。本文作者 Olivier Blanchard 于 2005 年 10 月加入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担任高级研究员。本文于 2017 年 4 月刊于 PIIE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投资者对中国投资者过度乐观

The Economist/文 沈仲凯/编译

导读：中国银监会新任掌门人郭树清上任不久就面临着重重挑战。中国银行业近十年来信贷规模的飞速扩张造成了银行体系内的诸多隐患，但郭树清本人似乎依然充满信心。更让人意外的是，除了郭这样的政府官员，国际上不少投资者与评级机构亦对中国金融市场持乐观态度。本文作者认为，近年来中国名义经济增速的提高、中国商业银行的坏账冲销以及中国银行业的效率提升确实有利于中国银行业的稳定发展；但另一方面，中国银行业看似漂亮的资产负债表背后是包括“坏账银行”、“债转股”等一系列的金融运作，而这些金融运作最终无法避免地将债务重新塞回银行手中。编译如下：

中国银监会的新掌门郭树清最近面临的挑战不小。有消息透露，目前中国银行业不良资产可能高达 33 万亿元——这一不良资产规模已经超过了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甚至超过了欧洲的总和；另一方面，近十年来信贷规模的极速扩张为中国银行业的未来发展留下了诸多隐患。上述问题恐怕新掌门郭树清都看在眼里，但明面上他并没有展现出过多不安，正如他在公开场合时说到的，“所有的问题和矛盾都将会得到解决”。

当然，郭树清的官员身份使其必须表达对于中国银行业的信心。但更令人意外的是，国际上的不少投资者与评级机构，同郭树清一样对中国金融市场持乐观态度。例如，摩根斯坦利声称中国的贷款机构运营状况良好；高盛不久前将中国股市评级提高到“增持”。但是，在这些乐观的态度背后，我们需要探讨的问题是：中国金融市场的繁荣与平和，将会是长期而稳定的状态，还是预示着未来的动荡与波折？

对中国的银行业而言，一个最为清晰的积极信号是中国名义经济增速的提高。尽管实际 GDP 增速可能并未有明显改变，从名义 GDP 来看，今年的增速将高达 10% 左右。更高的价格驱使公司获得更丰厚的利润；这对于那些负债累累的钢铁与煤矿公司尤为有利，它们将会更容易地去偿还它们的贷款。顺便指出，从 2012 年开始，中国银行业的问题贷款比例就在不断攀升，2016 年达到了 1.7% 的水平。很多分析师认为实际的坏账率可能远高于这一水平，甚至有人预测实际的坏账率高达 19%。不过，这种问题贷款比例的攀升速度在近两年有所缓和。

与此同时，中国的商业银行开始新一轮的坏账冲销。银行通过各种手段将不良贷款从它们的资产负债表中抹除，并将其中一部分转卖给投资者。更多的信用贷款流向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房产等更为安全的项目。摩根斯坦利的分析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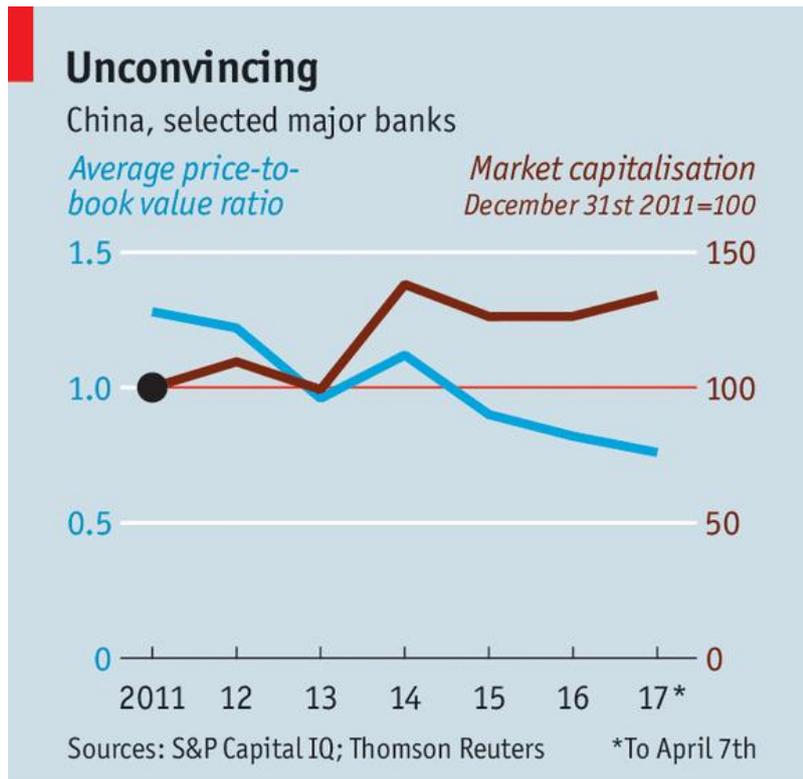
Richard Xu 指出，2020 年左右，中国银行业的高风险信贷比例将从 6% 逐步降低至 3%。

另外有迹象显示，为了应对互联网金融公司的挑战，中国的国有银行已经开始逐步提升其经营效率。2016 年，中国的四大国有银行进行了较大规模的裁员，并制作了专门的手机 app 以便个人用户进行支付或金融交易。去年全年，银行业资产规模上涨 12%，而成本仅上涨 0.6%，这一数据对比亦显示银行业经营效率的提升。

但是，上述各项积极的信号并不必然预示中国的银行业即将迎来又一次繁荣。银行看似漂亮的资产负债表背后是一系列的金融运作。在过去三年间，中国政府创立了 35 家资产管理公司（又称为“坏账银行”）。瑞士联合银行的 Jason Bedford 指出，这些资产管理公司通过购买银行的问题资产来帮助银行度过难关；但是另一方面，这些资产管理公司往往同样依靠银行的贷款充实资本。债转股是另一种金融运作的手段。债转股的逻辑是，将银行与贷款企业的债务关系，转换为第三方公司与贷款企业之间的股权关系。但是，这种股权本质上类似于债券的逻辑：贷款企业需要定期分享红利；而且，当这些企业无法实现预期的绩效目标时，它们将被要求从第三方资产管理公司手中重新回购这部分股权。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第三方公司的资本很大程度上亦来源于银行的表外项目投资（off-balance-sheet）。因此，无论是“坏账银行”还是“债转股”，这些金融手段无法避免地将债务最终塞回了银行手中。

上述金融隐患背后是中国银行业长期以来的信贷扩张。中国的债务占 GDP 比重已经从 2008 年的 150% 扩张到如今的 260%——对于其他经济体而言，这种债务扩张速度往往会带来严重的金融风险。不过，中国政府似乎已经意识到了目前的危险：如今，化解银行债务已经成为了政府的首要目标之一。好在今年中国经济的名义增幅表现良好，这为中国政府化解债务的尝试提供了缓冲的时间与空间。

但是，上述化解债务的努力本身又可能带来新的风险。在过去几个月，央行上调了银行的短期借债成本。这一举措对于那些过度贷款的银行而言无疑是一个重大打击：这些过度贷款的银行通过向其他银行贷款来维持运行；银行短期借债成本的提升将严重损害这些银行的利益。三月以来，已经出现了多家小型银行违约的报告，央行不得不紧急注入流动性以抑制局势的恶化。



从中国国内市场的反应来看，不少人并不看好中国银行业的未来走势。如上图，尽管中国银行股总市值（market capitalization）有所回升，银行股的市净率（price-to-book value ratio）依然不断走低；截至目前，投资者对银行股的估值只占银行净资产的 80%。就此来看，中国银监会新掌门郭主席的银行业重振之路恐怕任重而道远：除了控制金融风险，他还需要说服市场对中国银行业抱有更大的信心。

本文原题为“A New Mood of Optimism Infects Investors in China’s Banks”。本文作者不详。本文于 2017 年 4 月刊于 The Economist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G20 支持开放和包容的贸易投资体系的新举措

Sait Akman, Axel Berger, Uri Dadush, Simon Evenett, Lise Johnson, Maximiliano Mendez-Parra, Raul Ochoa & Claudia Schmucker /文 申劭婧/编译

导读：在非同寻常的挑战面前，G20 在 2017 年应该更加努力，以维护目前的全球贸易和投资体系，包括在关注中期改革的前提下，建立有效的多边争端解决机制。G20 应该将关注点放在以下几个方面：1. 支持世贸组织 2. 时刻关注贸易和投资的多重后果 3. 改善 G20 在解决贸易保护主义方面的措施 4. 促进投资。编译如下：

这篇政策简报的政治主张与 G20 轮值主席国德国在贸易和投资领域的两个优先考虑有关，一是支持多边贸易体系，反保护主义，二是投资促进措施。除优先事项外，电子贸易也被重点关注。将会在 T20 贸易与投资的政策简报中提及。

我们认为，G20 贸易和投资工作团队应该在其第三次会议上讨论 T20 在这个政策简报中提到的政策建议。在目前的政策环境下，应该优先考虑支持 WTO 的工作。在汉堡峰会和 2017 年 12 月 G20 轮值主席换到阿根廷的这段过度时期内，德国应该继续其在促进 G20 成员国间对话，加速推进开放包容型贸易投资政策的努力。这可以通过贸易和投资工作团队的一个非正式会议，或者一个包括 G20 各国政府和来自 G20 参与集团贸易专家的高级工作坊来实现。

为强调开放包容型贸易和投资体系的重要性，我们建议 G20 召开财政和贸易部长特别会议来促进交流，为随后 2017 年 7 月在汉堡举行的 G20 领导人峰会建立共识。这次会议应该结构明晰，这样不仅能产出政策改善方面明确的结果，而且可以最大化参会各方的共识。。

会议的议程应该包括：1. 在保证消费者持续受益的前提下，改善全球化和技术在就业和收入不平等方面暂时和破坏性效果的国家政策和国际改革；2. 减少全球不平等的国际合作；3. 减少贸易的非关税壁垒，4. 在自主、双边、诸边、多边政策上贸易改革的重新复苏。

本文原题为“Reconciling Hayek's and Keynes' views of recessions”。本文作者 Sait Akman 是土耳其经济政策研究基金会的成员，Axel Berger 是德国发展学会的成员，Uri Dadush 是 Bruegel 的非居民学者，Simon Evenett 来自圣加伦大学，Lise Johnson 是哥伦比亚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成员，Maximiliano Mendez-Parra 是海外发展中心（ODI）的成员，Raul Ochoa 是阿根廷对外关系协会的成员，Claudia Schmucker 是德国对外关系协会的成员。本文于 2017 年 4 月刊于 VOX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建立一个更具韧性和包容性的全球经济

克里斯蒂娜·拉加德 /文

导读:本文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干事拉加德于2017年4月12日在布勒哲尔研究所的讲演稿,载于IMF官网。全文如下:

感谢让-克劳德·特里谢和甘特拉姆·沃尔夫的热情介绍。同时,还要感谢布勒哲尔研究所选择在美丽的 索韦图书馆主办这次会议。

置身于这座精美的建筑,我联想到,好的建筑首先不在于它的几何结构或设计形式,而在于促进私人 and 公共空间内的人际关系。

我常常听我儿子说起这一点,他是一名建筑师;而且,我在读到建筑界的“诺贝尔奖”——普利兹克建筑奖的相关消息时也曾琢磨了一番。

上个月,当宣布加泰罗尼亚一家不知名的公司获得了今年的普利兹克建筑奖时,评奖团指出:[1]

“越来越多的人害怕我们会由于国际影响而丧失自己的本土价值观、自己的本土艺术以及自己的地方习俗。这几位获奖者帮助我们认识到,两方面的追求可以并行不悖——在深深扎根于本土的同时,向世界的其他地方张开怀抱。”

我们既然关注全球经济和金融的架构,就理应从上述言论中获得启迪。

当今时代,全球经济同时有两方面的需要——既需要建立稳健的国内政策基础,又需要坚定致力于开展国际合作。

我们需要利用上述国内和国际两方面因素,创建一个韧性更强的全球经济,同时形成可持续、更持久、更包容的经济增长。

前景

眼下的好消息是,经过六年令人失望的增长后,世界经济势头正在加强,周期性复苏带来了今后就业机会增加、收入水平上升、繁荣程度提高的希望。

但是,随着世界经济增长势头加强,我们也看到,至少在某些发达经济体,存在着对经济一体化的惠益的怀疑,存在着对七十多年来支撑世界经济的“建筑”本身的怀疑。

当基金组织189个成员国的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下周齐聚华盛顿出席我们的春季会议时,这些问题将成为他们关注的焦点。

他们将对全球经济状况作出评估,而我们也将照例在会议前几天发布《世界经济展望》。今天,我将谈一谈若干基本趋势。

- 发达经济体前景向好,原因在于制造业活动增强。经济前景的改善在各国(包括欧洲国家)不乏广泛的基础,尽管一些国家仍然面临债务高企和部分银行薄弱的问题。

- 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前景也有利于全球增长。这些国家最近几年推动了全球复苏，2017 年它们将继续占全球 GDP 增长的四分之三以上。
- 同时，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缓解了许多低收入国家的困难状况。然而，这些经济体仍旧面临着诸多严峻挑战，比如财政收入预计将远远低于经济快速增长年份的水平。

综合上述各方面因素可以看出，全球经济增长的脚步充满活力，这得益于许多国家近年来实施的稳健政策。

风险

然而，目前显然也存在着一些下行风险：政治上的不确定性，包括在欧洲；全球贸易受到保护主义威胁；以及全球金融环境趋紧，这可能会导致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出现破坏性的资本外流。

这些短期问题的根源在于生产率增长疲软，这一趋势继续对强有力的包容性增长造成严重阻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自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出现的人口老龄化、贸易增长放缓以及私人投资疲弱等问题。 [2]

我们估计，如果生产率按照 2008 年危机前的趋势增长，那么发达经济体的总体 GDP 将比目前的水平大约高出 5%。相当于全球经济中又增加了一个产出大于德国的国家。

政策

这表明，就经济政策而言，我们没有理由沾沾自喜。

我们需要利用那些已经对世界经济发挥了重大作用的各项政策。与此同时，我们必须避免种种政策失误，也就是我所说的“自讨苦吃”的行为。

我们该怎么做？我认为应当从经济政策的三个方面入手：

- 支持增长，强调生产率；
- 更加公平地分享收益；
- 通过已经有效服务于世界的多边框架，开展跨境合作。

一、支持增长

第一个方面是维持当前的增长势头。这就要求采取基金组织所谓的“三管齐下的策略”——针对各国的具体需要，恰当组合各项财政、货币和结构性措施。

例如，在一些经济体，需求依然疲软，通胀也未稳定回到目标水平。这就需要继续提供货币支持，并且更加重视有益于增长的财政政策——例如，改革税收和福利制度以强化激励，以及在有预算空间的国家扩大高质量的基础设施投资。

这些措施应当结合各项结构性改革以提升潜在增长率。比如，欧元区采取的一项有效做法是降低进入零售和专业服务领域的壁垒。

更为根本的是，政策制定者需要重振生产率。从长远来看，这是增加收入和提高生活水平提高的最重要渠道。

但各国政府应该如何提高生产率？

首先应当促进创新。例如，更多地投资于教育和基础设施，以及为研究和开发活动提供税收优惠。

我们的分析显示，如果发达经济体的私人研发活动平均扩大 40%，那么它们的 GDP 在长期内将增长 5%。

除了需要更多的创新，我们同样需要更多的贸易。为什么？因为贸易能促进创新的共享，并鼓励公司投资于新技术和更高效的行为。

例如，我们估计，中国融入全球贸易体系对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至 21 世纪最初十年中期发达经济体平均总体生产率增长的贡献高达 10%。[3]

随着时间的推移，此类巨大收益转化成了更高的生活水平。今天，之所以数十亿人能拥有更长的寿命并过上更健康、更富足的生活，主要是因为我们能够利用贸易和生产率的力量。

我们当然也知道，技术和贸易会产生消极的副作用——例如，萎缩行业内的失业，结构性改革给一些群体和地区带来的社会挑战，等等。

二、提高经济增长的公平性

接下来我谈谈政策的第二个方面——包容性增长。

简而言之，如果增长的惠益得到更广泛的分享，那么增长就会更有力、更持久，更有韧性。

你可能会问：“如果我们都明白这一点，为什么各国不设法更广泛地分享经济惠益呢？最近几年为什么这么多国家不平等状况加剧？”

不妨想一想技术。虽然技术为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利益，但是我们仍发现技术已经成为近些年来中低技能工人收入相对下降的主要因素，而贸易在这方面的作用则小得多。[4]

还有人担心，自动化会对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就业增长造成越来越大的阻碍。

当经济风向转变时，我们必须找到更好的方法为工人提供支助。

现实中不存在神奇的公式。但是，我们清楚地知道，更加重视再培训和职业培训、求职援助和搬迁支助，能够帮助那些受劳动力市场错位影响的人。

例如，美国应更加重视为求职和职位匹配提供设计完善的支持措施，包括采用各种在线工具。新兴经济体还可以设计技术解决方案，比如，通过个性化的手机文本信息发布职位空缺情况，等等。

展望未来，各国政府需要开展更多工作，帮助公民迎接重大技术进步。正如未来学家安德鲁·麦卡菲所言：“赢得比赛的关键不在于与机器一较高下，而在于借助机器一较高下。”

这就要求人们致力于终身学习——从幼儿教育到工作培训，再到面向退休人员的在线课程。例如，新加坡向所有成年人提供贯穿整个职业生涯的培训补助金。

基金组织通过越来越多的地区培训中心和各种技术手段，帮助政策制定者升级专业知识和提高实用技能。185 个国家的将近 1.7 万人顺利完成了我们开设的在线培训课程。

人口老龄化的国家也意识到了当下的政策不应该牺牲子孙后代的利益，不应该让子孙后代为今天这代人的鲁莽行为付出代价，包括继承受损的环境、破旧的基础设施以及庞大的公共债务。

如今，发达经济体的平均公共债务已经达到战后最高水平——相当于 GDP 的 108%。因此，我们需要制定强有力的财政框架[5]，并付出更大努力，将公共债务拉回安全水平，尤其是在老龄化社会中。

而老龄化社会的影响，尤其是通过养老金体系和医疗费用产生的影响，并不仅仅是发达经济体存在的现象。许多新兴经济体也需要为下一代人维持安全的体系。

我要说的第三点很简单：在这个高度互联的世界，国家政策往往会产生超越国界的重大溢出效应。我们好比坐在同一条船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鼓励各国支持强有力的国际合作。

三、国际合作

七十多年来，世界依靠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核心的一套规则、共同原则和制度体系应对了各种挑战。基金组织的一位总建筑师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将其称为“我们正在创造的更伟大的事”。

这就是国际合作的典型范例，这种合作推动了世界各地人们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

不久前，我们齐心协力，避免了“大衰退”发展成为另一场“大萧条”。通过多边框架开展的合作已然惠及了每个国家。

所以说，要促进更具韧性的经济增长，就需要开展更多而不是更少的国际合作。

例如，通过合作减轻过度的外部失衡极为重要，因为一个国家实施的不可持续的政策会影响其他国家。在这方面，合作意味着共同努力，确保各国维护公平竞争的环境，包括避免采取保护主义措施和造成竞争优势的扭曲性政策。

限制贸易是“自讨苦吃”，它会中断供应链，影响全球产出，导致生产资料和消费品价格上涨。而低收入家庭受到的损害最为严重，因为他们的消费在收入中所占比例最高。

我们还需要通过合作来确保金融稳定，包括建立一个更强有力的全球金融安全网，用以帮助新兴和发展中国家在遭遇困境时更好地应对资本流的波动。

为维持金融稳定，我们需要完成全球金融监管改革。这些规则，尤其是关于银行资本、流动性和杠杆的规则，已经加强了金融体系的安全性，同时也使纳税人更加安全，因为他们现在已不太可能为银行过度冒险行为付出代价。

此外，还需要进一步开展反洗钱方面的工作，打击恐怖主义融资。更宽泛地说，我们将支持通过改革来加强治理和打击腐败，包括打击逃税和避税，从而保证所有人都付出他们应付的一份。

最后，同样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共同努力，帮助那些最迫切需要改善生活的地区加快提高生活水平。帮助低收入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不仅是一个人道主义问题，而且有助于数十亿消费者充分参与全球经济。

为了应对诸如难民和人道主义危机、自然灾害以及气候变化等全球挑战，我们必须团结一心、风雨同舟。

基金组织的作用

正如大家所知，基金组织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了促进此类国际合作。我们将继续侧重于通过政策建议、必要的贷款以及能力建设等方式为成员国提供量身定制的支持。

这就是我们最基本的工作，我们将不断改进这一工作，以确保它始终切合实际并以成员国为重心。

与此同时，我们正在做出调整以适应各种新的宏观领域，目的是帮助成员国消除过度的收入不均以及 21 世纪技术和贸易带来的其他不利影响。

无论是通过增加宏观金融分析、强调性别政策对宏观经济表现的作用，还是加强全球金融安全网，我们的目标始终是维护经济稳定并促进建立能造福于所有人的更强大的全球经济。

结语

最后，我想回到建筑的话题，以伟大的古罗马建筑师维特鲁威提出的三项原则结束今天的讲话：

- 耐久——它应当能稳固屹立，不易损毁；
- 有用——它应当有使用价值，正常运作；
- 美观——它应当能愉悦心情，振奋精神。

让我们都成为杰出的建筑师。

让我们携起手来，建立一个更具韧性和包容性的全球经济。
谢谢大家！

本文作者 Christine Lagarde 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干事。本文于 2017 年 4 月刊于 IMF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1] RCR 建筑师事务所，其所有者为三位友人：拉斐尔·阿兰达、卡莫·皮革姆和拉蒙·比拉尔塔。

[2] Adler 等人（2017 年），基金组织工作人员讨论说明 17/04，“逆境是否导致全球生产率增速下降”。

[3] Ahn, Jaebin 和 Romain Duval（即将发表），“对华贸易：赢得了生产率但损失了工作”，基金组织工作文件。

[4] 《世界经济展望》第三章。

[5] 智利的财政责任法就是一个相关的例子；该法涵盖了一项结构平衡规则和各种基金（养老基金和稳定基金），并要求增加关于或有负债的报告。

美国与东盟：未来四十年关系展望

Amy Searight/文 章珏/编译

导读：从成立至今，东盟已经走过了 50 个年头。在新时期，东盟发展面临诸多挑战。在近期召开的“美国-东盟未来四十年关系展望”的讨论会上，与会者就提高东盟凝聚力，制定美国的东盟政策，拓展经济效力，完善机制效力，实现互联互通和深化人员交流等方面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文章编译如下：

今年是美国与东盟建立合作关系的第 40 年，也是东盟成立的第 50 个年头。值此时机，在美国政府支持下，CSIS 在菲律宾组织召开了“美国-东盟未来四十年关系展望”的讨论会。会议聚焦东盟发展中的核心议题，为提高东盟解决问题的效力，加强美国与该地区联系建言献策。

在东盟十国的努力下，东南亚地区已经从一个战后分裂地带转变成为一个经济充满活力的和平地带。东盟是推动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前沿阵地，正在积极推动 RCEP、AEC 等谈判；东盟还是地区的聚合中心，主持召开了东亚峰会、东盟区域论坛等一系列会议讨论各项议题。

虽然取得了一系列成就，但东盟作为一个组织正处在十字路口。不断上升的来自印太地区的战略竞争和与中国的海洋主权矛盾，以及在经济一体化推动过程上的滞缓，使得人们不断疑惑，所谓的“东盟方式”这种低效的共识推动方式是否是新时期实现该地区和平发展的最佳方式。

而这场会议为评估东盟现阶段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遇，会议的主要观点如下：

东盟凝聚力和战略远景

近几年，不断上升的南海争议使东盟一些成员国内形成了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思潮，进一步导致了东盟组织内的信任危机。

建议：

- 东盟应制定一个清晰有力、指导未来东南亚发展的战略远景，并顺应时机更新组织的目标，塑造区域新模式满足成员国利益。
- 为解决内部存在的低效问题，东盟应允许成员国基于自身最佳利益开展独立行动。
- 部分与会者建议重构东盟，校订章程，特别是关于共识的第 20 章，以解决因一人之利而无法开展集体行动的难题。
- 为增强区域影响力，东盟应考虑扩展友好合作条约至整个印太地区。

美国的东盟政策

特朗普上台后，很多人担心东南亚不是新政府的关心区域。

建议：

- 特朗普应参加今年的 APEC 会议和东亚峰会以彰显美国在该地区仍存在利益。
- 特朗普应主动召开美国-东盟峰会。
- 在该地区，美国政府需要制定一个综合参与战略，关注双边共同利益，而不仅是考虑到制衡中国的战略考量。

经济参与

特朗普宣布退出 TPP 对美国在该地区的信誉度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对挣扎于国内政治经济改革的东盟四国——文莱、马来西亚、新加坡和越南来说是一大创伤。16 个参与国一致同意在今年完成 RCEP 谈判，然而在很多议题上却远未达成共识。

建议：

- 为尽快完成 RCEP 谈判，参与国应尽快召开领导人高层会面。
- TPP 失效，美国政府应提升 APEC 在应对贸易障碍上的效力。
- 美国政府应制定一项后 TPP 时代的东南亚经济战略，部分人士建议美国政府帮助东盟协调 AEC 规则，解决非关税壁垒，提高知识产权保护。

基础设施和联通

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在东盟发展议题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与会国希望美国能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上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以平衡中国的影响力。

建议：

- 美国公司应与日本公司开展合作，近几年，后者在东南亚基础设施援建上不断取得重要成就。
- 美国公司应开拓方式，在该地投资可持续能源、教育、医疗以及网络等“软基础设施”。

东盟机制有效性

东盟秘书处正面临资金不足和人员不足的问题，使得其协调能力处于低级水平，此外，一些以东盟为中心的论坛在议题设定和行动落实上面临连贯性不足的问题。

建议：

- 应加强秘书处的效力。在关键预算之外，应允许个别国家为特定工程提供更多的资金和人力。
- 应在东亚峰会下建立一个全年有效的危机管理机制。为解决目前东亚峰会面对的机制效力低下的问题，有人认为应建立一个由峰会参与国组成的“和平与安全委员会”。

- 将东盟防长会议的召开频率由每半年一次改为每年一次。东盟成员国与8个对话伙伴国的防长应每年碰面一次以交换关于维护地区安全和深化防卫合作的意见，这将加强其效力。

人员交流

东盟国家和美国在促进相互理解，加强人民交流上还可以做得更多。

建议：

- 应鼓励更多的美国公民去东南亚学习。
- 应继续拓展 YSEALI（东南亚青年领导力倡议）。该倡议在建立地区联系，提高相互谅解和深化美国-东盟联系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本文原题为“U.S.-ASEAN Relations: Charting the Next 40 Years”。本文作者为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高级顾问、东南亚项目主任 Amy Searight。本文刊于2017年3月24日 CSIS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前景坎坷的美中关系发展道路

Timothy Heath/文 章珏/编译

导读：本月，习近平与特朗普在美国海湖庄园举行了第一次会晤。作者认为，虽然本次会晤顺利举行，双方达成了合作的共识，但是背后却是美中两国之间日益上升的对抗和竞争态势。双方分歧已经从具体事务扩展到了国际秩序和规则。作者认为，尽快找到协调分歧的新手段对于维护双边关系的稳定起着关键作用。编译如下：

在特朗普和习近平的首次会面中，两人都需要向对方展示各自的领导权威。特朗普需要显示在废除医改法案一举失利后，自己仍然掌控着大局。而今年中国将召开十九大，有能力与美国搞好关系将促进习的政治权威的巩固。

两人会面的最重要的任务是建立伙伴关系，依旧疲软的世界经济的恢复需要良好的中美经济关系，其他棘手的世界议题的解决也依赖于两个大国的合作能力。虽然外界对能否达成此目标持有较低的期望。

本次高层会面圆满举行，且两国共建了未来合作的基石，两国领导人对此成果都表示满意。但是，本次会面也预示着未来双边关系可能出现更激烈的矛盾。

在会面中，特朗普希望中国能与美国合作，对朝鲜采取更高压的策略。一再无视国际社会的谴责，朝鲜正在稳步发展可以抵达美国海岸的核武器。与前任政府一样，无论特朗普承诺如何解决朝鲜问题，他都会发现与中国政府合作仍是目前改变金正恩意愿的最佳选择。

减少对朝鲜必需的粮食和燃料的出口将是一则强硬的选项，但考虑到维护朝鲜地区的稳定，中国一直不愿采取如此激烈的举措。在会面期间，特朗普政府对叙利亚的导弹袭击显示了美国的意愿，即如果中国拒绝施压金正恩，那么美国将单方面对朝采取更加激进冒险的举措。

在其他事务上，中美之间的合作意愿也将受到对朝袭击的考虑的影响。在竞选期间，特朗普主打贸易王牌，当他成功当选后，他汲汲于纠正美国巨额的贸易逆差，挽救濒危的制造业。如同外界预料的那样，本次会面仅使两国领导人在承认中美贸易的重要性和开展未来合作方面取得共识。但是，中国政府的拖延行为可能促使特朗普寻求其他筹码以使其尽快让步，比如特朗普在尚未明确外交政策前就公开质疑“一中原则”。目前，中国将其视为一种博弈手段而采取克制态度，但若成真，中美关系必将进入一个寒冷时期。

在共识议题上都出现上升的对峙姿态，那么管控中美对峙议题将更加困难。虽然会面旨在烘托双方的合作氛围，但是现实却是中美正面临上升的分歧和竞争。关于一些高度对峙的议题，例如台湾、南海、东海等，本次会谈只是一笔带过，双方的严重分歧显而易见。

再者，双方关于国际领导权的争夺日益激烈。美国可能因国内事务而精疲力尽，但是解决许多相关事务也依赖于美国在全球投射自己利益的能力。中国似乎已接受了这场竞赛，习近平在不断开拓特朗普留下的真空，兜售中国是当前全球贸易和秩序的提倡者的理念。为此，中国宣称将举办一带一路的国际会议，如预期，特朗普没有任何加入中国提倡建立的亚投行的意愿。

战略趋势显示中美关系正在变得更加脆弱。四年前习奥会晤后弥漫的认为中国可以是维护现行法治秩序的合作伙伴的乐观心态正在逐渐消散。特朗普的当选后，这种首脑会晤形式的效力锐减，新形式将更多地聚焦于具体事务，但其稳定性和持久性可能不强。中美之间的不和已从个别事务延伸到国际规则和秩序，这将导致动乱。找到协调分歧的新方式对于确保双边关系的稳定和成功是关键。最讽刺的是，虽然美国倾向于聚焦国内事务，但是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繁荣的维持还依赖于美国加倍介入国际事务并革新其领导力。

本文原题为“Rocky Road Ahead Likely for U.S.-China Relations”。本文作者为前美国太平洋司令部高级分析师，现任兰德公司首席国际防卫研究分析师 Timothy Heath。本文刊于2017年4月11日 RAND 官网。[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本期智库介绍

The Center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CEPR) 经济政策研究中心

简介：经济政策研究中心成立于1983年。它包括七百多位研究人员，分布于28个国家的237家机构中（主要是欧洲高校）。其特点是提供政策相关的学术研究、并关注欧洲。Voxeu.org是CEPR的门户网站，受众为政府部门的经济学家、国际组织等。它的文章多为与政策相关的工作论文初稿，比财经报纸专栏更为深入，同时比专业学术文章更加易懂。

网址：<http://www.voxeu.org/>

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Chatham House (Chatham House)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

简介：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成立于1920年，位于伦敦圣詹姆斯广场著名的查塔姆大厦内。是目前英国规模最大、世界最著名的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之一。其宗旨是“推动个人和组织对日益复杂多变的世界进行全面研究，并提供政策参考。”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与英国政府、企业、媒体和学术界均有着广泛的联系，对政府的外交政策有一定的影响。在《2011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中，Chatham House 在全球（含美国）30大智库中列第2名，全球30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6名，全球30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4名。

网址：www.chathamhouse.org/

Brussels European and Global Economic Laboratory (bruegel) 布鲁塞尔欧洲与全球经济实验室

简介：布鲁塞尔欧洲与全球经济实验室成立于2005年，是主要研究国际经济的独立、非理论（non-doctrinal）的智库。致力于通过开放、基于事实并且与政策有关的研究、分析和讨论，对欧洲及全球经济政策制定作出贡献。bruegel的成员包括欧盟各国政府以及一些领先的国际公司。在《2011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中，bruegel 在全球（含美国）30大智库中列第16名，全球30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9名，全球30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3名。

网址：<http://www.bruegel.org/>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CFR) 外交关系协会

简介：成立于1921年，是美国非政府性的研究机构，致力于对国际事务和美国外交政策的研究。CFR是一个由精英学者组成的组织，成立伊始就成为20世纪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智囊机构，曾为威尔逊总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出谋划策。该协会主办的《外交事务》杂志曾刊登过乔治·凯南、基辛格和斯坦利·霍夫曼等美国知名外交家、国际政治学者的论文。在《2011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中，CFR 在全球（含美国）30大智库中列第4名，全球30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第6名。

网址：<http://www.cfr.org/>

RAND Corporation (RAND) 兰德公司

简介：兰德公司成立于1948年，是美国最重要的以军事为主的综合性战略研究机构。在其成立之初主要为美国军方提供调研和情报分析服务。其后，RAND逐步扩展，并为其它政府以及盈利性团体提供服务。在《2011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 中, RAND 在全球(含美国) 30 大智库中列第 6 名, 全球 30 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 8 名, 全球 30 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第 13 名。

网址: <http://www.rand.org/>

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Innovation (CIGI) 国际治理创新中心

简介: CIGI 是关注全球治理的独立智库, 由 Jim Balsillie 成立于 2001 年。它的主要活动包括资助研究、创造交流网络、促进政策讨论、提高多边治理能力。具体而言, 它的研究集中于以下四个方面: 全球经济、环境与能源、全球发展、全球安全。它致力于将学术应用于政治, 通过优秀的研究与分析来影响政治决策。

网址: <http://www.cigionline.org/>

Peter G.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PIIE)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

简介: 由伯格斯坦(C. Fred Bergsten) 成立于 1981 年, 是非牟利、无党派在美国智库。2006 年, 为了纪念其共同创始人彼得·乔治·彼得森(Peter G. Peterson), 更名为“彼得·乔治·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在《2011 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 中, PIIE 在全球(含美国) 30 大智库中列第 10 名, 全球 30 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 4 名, 全球 30 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第 1 名。

网址: <http://www.iie.com/>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简介: IMF 于 1945 年 12 月 27 日成立, 为世界两大金融机构之一, 职责是监察货币汇率和各国贸易情况、提供技术和资金协助, 确保全球金融制度运作正常, 其总部设在华盛顿。IMF 主要通过监督、贷款以及技术援助和培训三大职能来促成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IMF 的工作论文及其他出版物在全球宏观经济政策研究方面拥有巨大影响。

网址: <http://www.imf.org/>

Cato Institute 加图研究所

简介: 加图研究所位于华盛顿特区, 成立于 1977 年, 是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大型智库之一。加图研究所以古典自由主义传统为思想根基, 致力于“扩展公共政策辩论维度”, 通过独立、超越党派的公共政策研究和讨论, 旨在“恢复小政府、个人自由、自由市场以及和平的美国传统”。加图研究所的政策分析曾经影响过里根政府和布什政府的政策。在《2011 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1) 中, 加图研究所在全球(含美国) 30 大智库中列第 14 名, 全球 30 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 3 名, 全球 30 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第 8 名。

网址: <http://www.cato.org/>